

一、肩负起历史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一年多，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三日，一位年近半百的将军，出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踏上前往“世界屋脊”的万里征程。

这位将军就是张经武，他中等身材，体质比较瘦弱，但精神焕发，谈吐潇洒，颇有儒将风度。

在将近两百年间，清朝曾在这“世界屋脊”上派有驻藏大臣。今天，时代不同了，张经武这位将军，事实上就是当今的“驻藏大臣”。

张经武到藏不久，就兼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因此，在经营西藏、建设西藏的伟大事业中，含辛茹苦、艰苦奋斗了十五年之久。

在赴藏之前，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张经武，曾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这可能就是他的后半生和西藏连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他已基本上了解了西藏的情况、并掌握了中央的政策精神。

这年春天，在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下，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和谈代表团来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张经武为中央和谈代表团的全权代表之一。

谈判在友好团结的气氛中进行，经过二十多天的共同协商，于五月二十三日，双方全权代表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协议》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1）西藏人民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巩固国防。（2）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3）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对西藏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4）实行西藏民族内部团结，主要是达赖与班禅两方面的团结。（5）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6）根据西藏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生活。（7）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8）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协议》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光辉典范，得到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协议》的签订，震动了整个世界。

经过谈判，张经武深感西藏问题复杂，《协议》来之不易。

西藏地处祖国边疆，地广人稀，交通阻隔、高寒缺氧。早在十三世纪元朝初年，西藏即入中国版图，西藏民族成为中国优秀民族之一。十九世纪初，帝国主义在入侵中国沿海、内

地的同时，也侵入西藏，并在西藏上层中扶植了一批亲帝国主义分子，这批勾结帝国主义的上层分子即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决定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同时，即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措施，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来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西藏当局拒绝进行和谈，并驻重兵于昌都和金沙江一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入藏，人民解放军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打了昌都战役，解放了昌都。

昌都战役后，亲帝国主义分子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下台，年仅十六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掌管了政教事务大权，按照西藏历史惯例，达赖不满十八岁是不能执政的。西藏地方政府仓促为达赖举行了亲政仪式之后，一些亲帝国主义分子便将达赖挟持到边境亚东，伺机再把他带到国外。这次来京的西藏地方和谈代表团，就是达赖到亚东后决定派出的。

《协议》不仅要解决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消除汉藏民族之间历史上的隔阂问题，还要解决西藏民族内部长期以来不团结现象，即加强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的团结。

西藏地方政府发给和谈代表的“全权证书”中，本来已写有承认“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的内容，但暗中又指示和谈代表不得许可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于是，在谈判中西藏代表一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又不赞同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对此，中央首席代表李维汉作了详细解释，指出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巩固国防的重要。西藏首席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认为，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就没有理由不同意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如果不同意解放军进藏，和谈就根本没法进行。西

藏和谈代表经过认真讨论，同意了“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这一条款。

谈判中，当谈到维持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时，问题更难解决了。西藏地方政府即达赖集团，班禅问题是达赖集团最敏感、最忌讳的问题，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两个集团长期不和，班禅逃到祖国内地青海已长达近三十年之久，双方隔阂、猜疑很深，现在已是第十世班禅了。因此，西藏和谈代表说，他们这次来京是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未授权谈班禅问题，他们不同意《协议》中列入这一条款。经中央和谈代表进行解释后，他们还是不同意，甚至表示如谈判不成，他们则立即返回西藏。这个问题从五月十三日到五月十九日，僵持了整整一个星期。十九日下午，中央和谈代表解释说，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时期的固有地位及职权。这样，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才表示同意了，最终达成了协议。

阿沛·阿旺晋美为了返藏后让达赖了解谈判情况、接受签订的协议，在和谈代表每次商谈问题时，都请和谈代表团的翻译彭措扎西（达赖的姐夫）参加会议。即使如此，西藏和谈代表仍然心中不安，直到五月二十八日接到达赖从亚东来电，完全同意将班禅问题列入协议，他们的心情才轻松下来。

张经武回想着，在二十多天的谈判中，双方那种斟酌字句、折冲尊俎的情景，那种会内会外、宴游之间相互商谈的情景，那种反复地汉文翻译藏文、藏文翻译汉文的情景，那是何等认真而又细致呀！

此刻，他又要肩负重任，前往西藏，去解决一系列极为

复杂的问题，那又该是何等艰巨的任务呀！

现在协议刚刚签订，达赖还在亚东，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策划下，仍然企图使达赖逃到国外，搞乱西藏局势，阻挠西藏解放。

亚东离印度相距咫尺，一日之内，达赖即可越山出境，劝说达赖返回拉萨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在此情况下，中央一方面命令人民解放军执行《协议》，开始向西藏和平进军，同时又立即任命张经武为赴藏代表，要他绕道香港、印度，到亚东去劝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顺便交代一下，张经武此时是“中央赴藏代表”，而不是“中央驻藏代表”，在他离开北京和到达拉萨时，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均称“中央赴藏代表”。他的主要使命还仅是到亚东劝说达赖返回拉萨。

当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入藏人民解放军也到达拉萨之后，西藏已经实现和平解放，这时中央才又任命张经武担任了“中央驻藏代表”。

可以看出 张经武受命中央赴藏代表和中央驻藏代表 是随着西藏形势的发展，名义上有所变化、有所不同而已，实质上没有大的差别。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向张经武交代了入藏任务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要他挑起重担，努力完成任务。

毛泽东主席在丰泽园接见张经武，谈话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

毛主席坐在沙发上，分析着协议签订后的西藏形势，分析达赖集团的动向。

毛主席把达赖托西藏和谈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给他带来的一封信，交给了张经武：

“看信的口吻，达赖不会很快就逃亡国外，还在亚东。达赖年幼，他周围的一些反动分子是会竭力煽动他向国外跑的。”

张经武也认为达赖不会很快逃往印度，但情况处在动荡之中。

毛主席在谈话中指出，张国华率领的第十八军，从昌都入藏还有一些准备工作，抵达拉萨当在两三个月以后，所以张经武需从香港、印度、直达亚东见达赖，敦促他早日返回拉萨。

张经武说他也认为需要从印度进入西藏，这样不仅时间快，对劝说达赖也有利，如果同入藏部队一起走，西藏形势不稳，大军压境，搞不好，还有可能把达赖挤出国外。

毛主席把写给达赖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张经武：

“任务重，时间也紧啊！还有什么困难吗？”

张经武站立起来，坚决表示：

“请主席放心，我要尽一切努力，坚决完成任务。”

谈话后，毛主席送他到门口，又一再嘱咐：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实行爱国一家，一定要说服达赖返回拉萨。

赴藏任务重大这句话，是毛主席对张经武极为重要的嘱托。在这之前，张经武多次反复思考了这一问题。在谈判和签订协议时，他已有颇深体会。在谈判前和谈判期间，身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张经武同进藏部队司令员、第十八军军长、也是和谈代表张国华，多次交谈进军情况时，也有深切感受。

签订协议的当天，张国华向毛主席汇报进藏部队情况时，他在场听到毛主席边听汇报、边插话指示，更是句句记在心

头。

那天，毛主席这样指示：

“你们在西藏考虑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张国华在汇报中提到进藏部队中有些干部说，今后在西藏工作会像乌龟爬山一样慢时，毛主席又笑着说：“我看像乌龟爬山还快了。”

那“世界屋脊”上的西藏，对他是多么神秘而又陌生。那里比任何一个省都特殊，他都不熟悉。那里又是全国唯一的没有党的地下组织的地方，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他工作，为他提供那里的情况。他是在人民解放军到达西藏之前，单枪匹马去的西藏。

这些，都使张经武感到身上肩负的担子是何等重大。现在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又浮在张经武的脑际：

今后到西藏，在那原封不动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怎样开展工作呢？西藏历史上长期形成了达赖、班禅两个集团的严重不和，又怎样去解决呢？这都是他从来没有遇到的、又难以设想的重大问题啊！

任务重大，时间紧迫，不能有任何犹豫。张经武立即召集随他赴藏的有关人员，传达任务，准备行装。

深夜，他回到家里，把赴藏的紧急任务告知妻子杨岗。他兴奋地对杨岗说：“西藏和平解放，关系到祖国大陆的统一，意义十分重大，中央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我，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都要克服它，决不辜负党和国家的重托。”

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张经武结成革命伴侣的杨岗，出乎意料地听到这个消息，心情自然感到震动，为他单枪匹马、要到遥远的西藏高原惴惴不安，对他说：“我和你一起去吧！到

西藏也好照顾你的生活。”

张经武想 此次赴藏 边疆路途万里 高原空气稀薄 倒是需要杨岗陪他前往。一九三九年冬，党中央让他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率领代表团赴延安参加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就是杨岗陪他一同前往延安的。一路上，穿过日寇层层封锁线，边打边走，边走边打，住老乡土炕，吃小米窝窝头，抢渡黄河，路上两人相互照顾，走了一年，才到达陕北延安。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杨岗不能陪他同赴高原。

于是 他耐心地安慰杨岗说：“你身体不好 西藏形势尚模糊不清，你暂时不要去，等打开局面后，看情况，再说吧！”^①

张经武南征北战，戎马一生，出生入死，历尽种种艰难险阻。他每次接受重要任务都是欣然受命，义无反顾。

张经武一九 六年出生于湖南省酃县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三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一年到中央苏区从事军事工作，一九三四年跟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中央军委直属教导师师长、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负责保卫军委机关的任务，跨越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战胜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胜利到达陕北。

在长征途中 战斗频繁 部队伤亡很大 到滇黔边境 教导师政委何长工突然病倒，作为一个师长的张经武和警卫员扎起担架，亲自抬着何长工，艰苦行军作战。他在长征中的这一事迹，被传为美谈。何长工后来在同别人谈话时也说：

杨岗：《怀念张经武学习张经武》，载《西藏革命回忆录》第1辑。

“这一感人事迹，使我永生难忘。”^①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前夕，他遵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前往华北，以红军联络官名义，到河北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会晤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宣传我党联合抗日主张，促使宋哲元奋起抗日。

抗战爆发，天津失守，山东危急，他又受命，以红军代表名义，只身前往山东济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反复交涉，迫使韩复榘一个月内释放全部关押的我党同志六十多人，这批同志出狱后壮大了我山东抗日武装。

一九三八年秋，八路军山东纵队建立，张经武任纵队司令员，开辟了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

当年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老战友黎玉、王彬、林浩曾回忆张经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许多往事，赞扬张经武在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磨擦反共的斗争中，牢牢掌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一九三九年四月，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军统复兴社头子秦启荣匪部，袭击我纵队一个支队，惨杀我军一批干部战士，造成有名的“太和惨案”。张经武一方面在国民党东北军于学忠和西北军石友三部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严守中立；一方面率领山东纵队三个支队，同秦启荣匪军激战两天一夜，终于彻底打垮了这支反共特务土匪部队。^②

一九三九年底，张经武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带领山东代表团前往延安，出席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到延

王锡堂：《张经武传》，载《西藏党史通讯》1989年第2期。

^② 黎玉、王彬、林浩：《深切悼念张经武同志》载1979年8月28日《解放军报》。

安后，党的“七大”推迟召开，他先后担任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参谋长、陕甘宁留守兵团副司令员、晋绥军区参谋长。在贺龙领导下，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立下了赫赫战功。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蒋介石发动内战，美国出面调处，共产党、国民党和美方三方面代表小组成立，张经武为三人小组代表，不久又担任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参谋长，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张经武担任西安市警备区司令。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又调任西南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军委办公厅主任兼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

二十年的战斗经历，是张经武军事、政治双翼齐飞的二十年，他既能率兵打仗，指挥作战；又善于在各种复杂、艰险的环境中，应对各方，作好统战工作。从这里也可看出中央为什么要他挑起驻藏代表这一重担。

经过几天匆匆准备，张经武便轻装简从，仅率领十二人，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三日，离开北京，奔赴西藏。

在他的一行中，有他的助手乐于泓（即阿乐，进军中的中共西藏工委办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对外用进藏部队联络部长名义）、副官李天柱、藏语文翻译彭哲、医生徐乐天、机要译电员兼机要秘书郝广福、警卫员李永珂等。另外，与他同行的还有几位原来经印度、香港来京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拉乌达热·土丹旦达和翻译彭措扎西（达赖姐夫）等。

二、尽快上高原

南下火车，风驰电掣般穿过祖国华北大平原，驶向汉口，再驶向广州。

在广州，张经武为了研究由香港到印度的具体行程问题，停留数日。利用旅行中的短暂时日，应邀为中共华南分局介绍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经过。

到香港，火车一进九龙，就有一批香港和英美记者蜂涌而上，围上前来，进行采访拍照，均遭张经武拒绝。

到香港次日，合众社记者就发出消息，造谣说：“张将军（指张经武）到西藏拉萨是进行接管的，中共人员显然身上带有手枪，‘保护’西藏代表。西藏代表称他们没有得到许可答复记者提问。西藏代表长辫子盘在头上，不敢外露，戴帽子掩盖着。”

张经武对此无稽之谈，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不愿在香港久留，他急切地想赶快登上高原。^①

^① 乐于泓日记。

但是，他又不得不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为他们安排的一座豪华的摩星岭福利别墅住了几天。

在香港，他遇到一个乘船、还是乘飞机的问题。乘飞机需要几次转机，不能携带到西藏为统战工作准备的大小多达七十多箱的各种礼品乘轮船时间较长，万一达赖出走，将失去良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最终，张经武决定，他携带毛主席致达赖的亲笔信和几名急需的随员乘机先行。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争取时间，尽快与达赖接触。”

于是，他决定让乐于泓（阿乐）、彭哲、郝广福三人同他一起先行，其余九人携带一些物品随后赶到亚东。大家考虑到西藏气候恶劣，空气稀薄，环境艰苦，张经武又年近半百，身体比较瘦弱，建议让中央专门为他指派的徐乐天医生同他先行。张经武拒绝了，说后边走的人多，路上走的时间长，更需要医务人员，我不需要医生，人少行动更方便。大家考虑到他沿途的安全，建议负责保卫工作的专职人员李天柱与他同机随行，张经武也以“没有必要”而拒绝了^①。

从香港到新加坡的飞机每天均有，机票好买。从新加坡到印度加尔各答，一星期只有一次班机，错过一趟班机，则可能耽误大事。因此，他又几次催促工作人员一定要订好飞往加尔各答的飞机票。还算幸运，张经武终于按时从香港起飞了。

张经武一行四人，和西藏和谈代表一行数人，先飞新加坡，住了一宿，又飞加尔各答。然后再乘飞机，飞到西孟加拉邦北部的一个小城锡里格，然后又改乘汽车，穿山区公路继续北行，于七月十日到达印度北部通往西藏交通要道上的

郝广福：《在张代表身边的日子》，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一个山庄噶伦堡。

噶伦堡是一八八八年、一九〇四年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的一个桥头堡。四十多年来，这个山庄建设得繁华起来，除仍有一些低矮、阴暗的居民住房外，也有豪华漂亮的西洋别墅和饭店。现在，这里是一个诡秘的山庄，居民除印度人外，还有尼泊尔人、西藏人和某些西方人。这里是特务间谍往来麇集之所，特务间谍的目标自然就是西藏，他们在这里直接指挥着西藏上层中的一些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分裂活动。现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虽然已经签订，但他们仍然鬼祟地四处奔忙着。

就在这样一个诡秘、狡诈的地方，张经武开始行使了中央代表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在这时开始进入他所担任的角色。

张经武胆大心细、随机应变，排难除险。他已有在抗战前夕和抗战爆发之际的险境里应对宋哲元、韩复榘等练就的文武韬略，现在他更是胸有成竹、运筹自如了。

张经武到达噶伦堡的头两天，亚东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派出迎接中央代表张经武的帕里宗本（相当县长）雪康·索郎塔杰已来到噶伦堡。当张经武一行到达时，雪康和其他西藏在噶伦堡的商务代表处代表、大商人，在张经武下榻的一个别墅大门口，上前迎接。献上哈达后，一同进屋。张经武坐下，喝了一口茶，即关心地问候：“达赖喇嘛在亚东身体可好？”马上又接着说：“你辛苦了！”

两句话，使对方感到亲切和蔼。雪康回答：“达赖喇嘛佛体康泰。”^①

^①雪康·索郎塔杰：《迎接中央代表进藏记》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张经武明白，达赖是西藏僧俗人民崇奉的精神领袖，是“佛”，是“神”。

据雪康说，在这个饭店里，头几天就曾有几个为英国做特务工作的“巴布”（藏语对这种特务的称呼）在饭店周围和饭店内东张西望，打听张经武到来的消息。张经武对此好像已有所料，镇静如常，满不在意，照样同雪康随意聊天。

这天下午，张经武约见了西藏在噶伦堡有影响的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解释《协议》精神，对《协议》规定的“对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这一条作了反复解释和说明。张经武最后强调说：“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诸位朋友如有机会，请将今天的约见和谈话，向达赖喇嘛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报告一下。”^①

当天晚上，西藏商务代表处官员以及与达赖有密切关系的大商人邦达养壁、桑都仁青等在喜马拉雅饭店为张经武举行了宴会。张经武在宴会上祝贺《协议》的签订，祝贺藏汉民族的团结。宴会上大家互相敬酒，气氛愉快。

这一天，在特务出没极为复杂的噶伦堡，是张经武工作繁忙的一天。这一天，张经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向亚东达赖喇嘛传递了信息。

十七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没有逃亡印度，还在亚东。

据达赖在他后来写的一本书中说：“几天（指协议签订）后，一封从北京代表团发来的冗长的电报送到。电文除了重复我已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内容外，别的没提太多。阿沛在电文中还告诉说中央代表张经武已在从北京途经印度来藏途中。达赖在他写的那本书中还说，这时，他的大哥当才也从

郝广福：《在张代表身边的日子》，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印度送来一信，告诉已同加尔各答美国领事馆取得联系，力主达赖逃亡美国。^①

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即五月三十一日，阿沛·阿旺晋美由北京向达赖喇嘛和亚东噶厦电告了和谈经过及《协议》内容，噶厦立即召集官员会议，讨论协议和达赖逃亡国外或返回拉萨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参加会议的除达赖副经师赤江·洛桑益西、达赖的三哥洛桑三旦以及噶厦在亚东的重要僧俗官员外，还有在印度、现返回亚东谋求西藏“独立”的代表夏格巴孜本。会上，赤江·洛桑益西、洛桑三旦、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实权人物，都认为大事已坏，主张达赖立即逃亡印度。但是一些僧官和三大寺的代表则主张达赖返回拉萨。据说，主逃派郎色林和主和派仲译钦波群培土登激烈争论，大打出手。两派相持不下，互不相让。于是，会上决定采用卜卦求神方法，实行抽签。结果也是犹疑不决，模棱两可。于是，达赖留在亚东。

事情再回到噶伦堡。也是在张经武抵达噶伦堡的这天晚上，同样也在喜马拉雅饭店的舞厅里，饭店主人，一个年已八十、懂得藏语、名叫麦克仲萨的英国人，在众多歌舞着的人群中，摇晃着脑袋，捶着胸膛，用藏语哀伤地唱着一首歌：“宝在手中不爱宝，失去宝贝悔恨迟……”这个英国人，对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现实，痛苦地发泄着自己的愤恨。^②

事后，雪康说，这个名叫麦克仲萨的饭店主人，曾在一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康鼎由英文翻译中文，翻译书名改为《达赖喇嘛自传》。

^② 雪康·索郎塔杰：《迎接中央代表进藏记》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九 四年参加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到达过拉萨，长期担任过江孜和亚东的商务官员，是一个“西藏通”。后来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到印度时，他曾担任过接待员，与前后藏的一些大贵族关系密切，与西藏的反动噶伦夏扎、索康都有接触。

张经武对这种情况，不免有些忧虑，但也认为这些人也只不过是望天悲叹、枉费心机而已。

次日上午，噶伦堡一所华侨学校——中华中学的师生在该校为中央代表张经武举行欢庆会，参加欢庆会的有这里的西藏官员和大商人邦达养壁、桑都仁青以及该校师生一百余人。张经武在欢庆会上讲了话，西藏官员和商界代表也讲了话，共同祝贺《协议》的签订。

当地一家反动藏文报纸《镜报》的编辑也在会上讲了话，他公开表示不欢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他无可奈何地说什么：“地球是转来转去的，很难说清楚谁是属于谁的。”^①

下午，张经武离开噶伦堡，当地华侨和中华中学师生冒雨送行。在蒙蒙的细雨中，师生情绪高涨，热烈欢呼。张经武目睹此景此情，非常感动，向华侨学校捐赠印度卢比三千盾。^②

接着，汽车北行，于七月十一日到达紧邻西藏的一个小国锡金首都甘托克。锡金人口十一、二万，首都甘托克只有两千余人。锡金在历史上和西藏有着密切的关系，互相联姻，清代原是中国的一个友好藩邻，每年派部长、大头人向达赖呈递哈达，在达赖喇嘛前瞻礼，并叩谒清朝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对其各有所赏，驻藏大臣还赏给顶戴。遇有灾害，西藏

雪康·索郎塔杰：《迎接中央代表进藏记》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乐于泓日记。

噶厦（西藏地方政府）还有赈贷。一八八八年，光绪年间，英帝国主义第一次入侵西藏时，占领了锡金，当时锡金叫哲孟雄。清廷派遣驻藏大臣升泰，与英印政府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锡金逐渐成了英印的保护国。印度在这里驻有专员，掌握着锡金军政大权。

张经武到达这里后，锡金王子的秘书和印度专员的代表前来拜见，张经武以礼相待，进行了友好交谈。

在这里，张经武了解到锡金和西藏历史还存在着一种有趣的文化、姻缘关系。锡金王子的妻子是西藏一家贵族的女儿，锡金的文字也是藏文，语言与西藏略有不同，风俗习惯彼此大同小异。英军入侵后，锡金风俗习惯发生了某些变化。

张经武这个新中国的“驻藏大臣”，在甘托克想着近百年来西藏的变化，想着锡金的变迁，心潮起伏，感慨不已。满清末年朝廷昏庸腐败，丧权辱国，致使藏事凋蔽，鞭长莫及，又复丢失友好邻邦。可悲！可叹！

张经武在这里住了一天。次日，又匆匆改乘骑马，向东北方向行走，翻越中、锡边界喜马拉雅南侧的群山，向西藏的边城亚东前进。

经过两天翻山越岭，进入西藏境内。

踏上祖国的土地，他立即心情振奋，感到每一个山峰、每一块山石都无比亲切美好。

这天下午，几个藏胞前来，给雪康带来了一袋糌粑。张经武看见他在吃糌粑提出也要吃，雪康说：“现在你不能吃，连我们在印度住一段时间也都不吃糌粑，怕不服水土泻肚。”

张经武亲切地对雪康说：“我们要学习藏族的生活习惯，我得先学会吃糌粑。”

雪康还是劝他说：“在路上吃，万一闹起肚子来就不好办